

目 录

罗荣桓	李 圭 (1)
邓 华	罗印文 (120)
安体诚	张守宪 董建中 (177)
杨峻德	冯 奇 (201)
林道文	林锦文 (215)
段玉林	裴年松 (231)
彭之玉	荆 国 (249)
杨幼麟	谢秉忠 (263)
彭干臣	张锡岭 彭醒华 (275)
孙仲德	蒋晓钟 (291)
冀朝鼎	曹云鼎 李 吉 (312)
郭晓棠	张仁荣 (329)
张克侠	杨明训 谢公义 张光天 (339)

中共黨史人物傳

陳庚為宣



罗 荣 桓



邓 华



安 体 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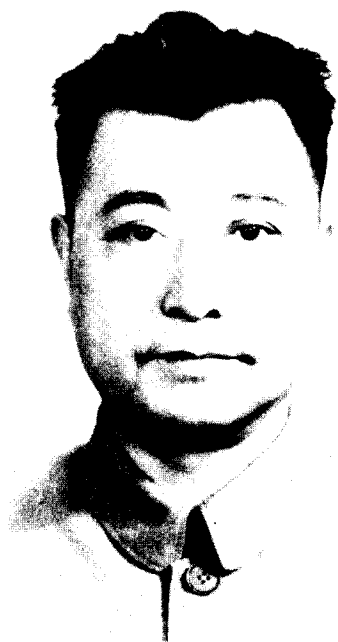
杨 峻 德



杨 幼 麟



彭 千 臣



孙 仲 德



冀 朝 鼎



郭 晓 棠



张 克 侠

本卷缺林道文、段玉林、彭之玉照片

罗 荣 桓

李 圭

青少年时期

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旧历壬寅年十月二十七日），罗荣桓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现衡东县杨林区鱼形乡）。他的祖父罗汇吾，以教书为业。父亲罗国理，二十岁时当过童蒙教师，后来借钱在南湾开了一个“永隆”杂货铺，兼卖中药，家境渐渐好转，添置了一些田产，并担任了黑田罗氏的征首（即族长）和乡里的团总。一九〇八年以后，因受人诬陷，打了几年官司，家境开始衰落。罗荣桓的母亲姓贺，为人宽厚，勤劳善良，亲友称誉她“外柔内刚”，是“寒林一枝之秀”，她对子女既严格要求又非常爱护，对罗荣桓影响很深。

罗荣桓原名镇慎，字雅怀，号宗人。在读高小时，一位国文老师取诗经“桓桓于征”之意，为他改名荣桓。有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第六。六岁时，父亲就教他识字读书，八岁入私塾。他学习刻苦，除了学校的功课以外，还翻出家里的藏书，废寝忘食地阅读。十二岁，罗荣桓进本村罗氏岳英小学读书。他对学校开设的国文、算术、博物、历史、地理等课很有兴

趣，学得很认真，对历史上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非常景仰，曾写过一篇《论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①的作文，称赞大禹公而忘私的高贵品德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被老师选为范文。一九一六年夏，罗荣桓高小毕业后，又在家乡读了三年私塾。

一九一九年秋天，罗荣桓离开闭塞的南湾到长沙，考进协均中学（原名谊群补习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新旧思潮斗争激烈：一方面，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日益高涨；另一方面，“读经”复古的逆流也在泛滥，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和学说纷纷出现。罗荣桓如饥似渴地学习，汲取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其中，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对他影响最深。他从毛泽东充满革命精神的文章中，受到了感染，吸取了力量，看到了希望。这年底，他参加了长沙人民反对军阀张敬尧和抵制日货的活动。

一九二一年暑假，罗荣桓由长沙回家，遇到寒水乡地主萧罗仙不顾天旱歉收，率众到南湾刈禾退佃，他父亲罗国理为了保护族人利益，出面制止，双方争吵，引起械斗，受地主诬告再一次吃了官司。这件事使罗荣桓进一步认识到“民众大联合”的重要。于是，他以长沙学生联合会为榜样，邀集衡山东乡土字和梦字地区的同学（当时衡山县按十七个字划分地区），在南湾成立了土梦学友联合会。宗旨是“联络感情，增长知识，移风易俗，促进社会”^②。罗荣桓被选为会长。联合会的一项主要活动是开展平民教育，他们利用岳英小学的校舍，因陋就简办了一所农民夜校，设国文、算术两门课，罗荣桓教算术。夜

①中共衡东县委宣传部编：《怀念罗荣桓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10 月版第 92 页。

②中共衡东县委宣传部编：《怀念罗荣桓同志》，第 93—94 页。

校还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深受农民欢迎。

一九二三年三月，罗荣桓和同学们在柳直荀带领下，参加了长沙各界六万多人要求归还旅顺、大连，否认卖国的“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四月，以郭亮为主席的湖南外交后援会号召对日本实行经济绝交。罗荣桓又走上街头积极参加了演讲和搜查日货。六月一日，日本水兵在长沙湘江边向我进行爱国活动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二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罗荣桓以极大的愤慨投身到这一反日爱国运动中，参加了六月一日晚和第二天工人和学生举行的抬尸游行和六月四日召开的追悼大会。湖南军阀赵恒惕宣布戒严，准备镇压。罗荣桓被列入“不法学生”黑名单，不得不回乡暂避。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实行对日经济绝交，他不坐从长沙开往衡山的日本轮船，走了几天旱路回家。

一九二三年暑假，罗荣桓来到北京。他和几个同学住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里，补习功课，准备考学。湖南的反动政客易家铤，曾到湖南会馆召开同乡会，鼓吹“联省自治”，为赵恒惕歌功颂德。罗荣桓和同学一起揭露易家铤的骗局，并高喊口号把他轰出了会场。

在北京的一年里，罗荣桓通过读书和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一九二四年六月，补习学校的功课结束，他考上了山东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七月中旬离开北京去青岛入学。

在青岛大学，罗荣桓进行过“实业救国”的尝试。为了抵制日货，他和几个同学发起组织三民实业社，吸收投资，每股五元，筹集了二三百元资金，自己动手生产出纱布、药棉、墨水、肥皂等日用品。罗荣桓看着这些刚出厂的产品，十分高

兴，立即给南湾老家寄了一大包肥皂，写信说：这是同学们自己做的，不要再叫它“洋碱”了，应该叫它肥皂。但在当时中国整个民族工业都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压迫的情况下，几个青年学生仅凭一腔爱国热情办起来的小小手工作坊，怎能经得起风浪，不到一年就夭折了，连股本也没有收回来。

一九二五年四月，在上海工人大罢工的影响下，青岛日本纱厂的三万多工人举行了大罢工。五月二十九日，胶澳督办温树德秉承日本人的旨意，调集军队镇压，打死八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青岛惨案，激起了青岛各界人士的无比义愤。青岛大学在学生会组织下，于五月三十一日开始罢课。罗荣桓是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带领同学参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慰问死难者家属，募集救济金支援青沪两地工人。学校成立了义演话剧团，他到处劝售戏票。他还受青岛学联的委托，去上海进行宣传活动，揭露青岛惨案真相，呼吁青沪各界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在整个“五卅”运动期间，罗荣桓表现了满腔爱国热忱和卓越的组织工作能力，赢得了同学们的敬佩。

罗荣桓在青岛大学读书时，思想活跃，考虑的问题很多，例如：怎样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怎样摆脱帝国主义的瓜分，怎样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总之，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谈论人生观时他表示：“我也想当工程师，当建筑师，但是现在看来，首先要和恶势力搏斗，否则什么事也做不成。”^①。在谈到对政党问题的看法时，有的同学认为，任何政党都是争权

^① 黄瑶：《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桓》，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以后引文凡出自此书的，不再一一注出。

夺利，假公济私，因此还是不参加政党为好。罗荣桓则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如果能以以往政党不好的一面改正过来，在对付恶势力方面还是必要的。”

一九二六年六月，罗荣桓在青岛大学预科结业后，和同学张沈川一起乘船经上海、厦门去广州。八月，罗荣桓到广州后报考中山大学工学院，因第二外语德文没有考好，未被录取。这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报上不断传来北伐胜利和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兴起的消息，罗荣桓决心投身于伟大的革命运动之中。

同年秋，罗荣桓回到家乡南湾，积极参加当地的农民运动。他先到县城和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及县农民协会联系，听取指示，接着召集积极分子在鱼形山上开秘密会议，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建立农会，开展斗争，解放自己。此后，他又挨家访问宣传，动员农民参加农协。十一月（旧历十月），衡山梦字九区农民协会成立，罗荣桓是农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大会上宣传革命形势和农会成立的意义与任务。会后，全体会员高举“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标语和旗帜游行。罗荣桓还组织了南湾女界联合会和儿童团。他起草章程，挨户动员，并出席了两个组织的成立大会，还在会上讲了话。他还领导群众斗争了杀害儿童团员的反动地主罗凤梧，使地主豪绅威风扫地。南湾的农民运动从此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地主豪绅的仇视和反抗。一九二七年二月，湖南国民党右派、地主“保产党”头子刘岳峙组织

“左社”，诬蔑农民协会是“地痞流氓”组织。各地土豪劣绅闻风而起。南湾地主罗凤梧、肖罗仙等一面造谣中伤，骂罗荣桓是“罗痞子”，一面搜罗流氓地痞另立假农会与农会对抗，并密谋暗杀罗荣桓。罗荣桓对这些诬蔑、恫吓毫不畏惧，写文章揭露了他们的罪恶，号召贫苦农民坚持斗争。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罗荣桓在武汉读书的同学来信，谈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武汉后的革命形势，要他到武汉去。四月十四日，在农友的护送下，罗荣桓摆脱了地主豪绅的监视，离开衡山经长沙到达武汉。

罗荣桓到武汉后，一面在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读书，一面从事学生运动。他积极参加了声讨夏斗寅、许克祥叛变的集会游行、街头演讲、化装宣传等活动。这时，罗荣桓在青岛大学的好友彭明晶也在武汉，由彭明晶介绍，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支部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红军党代表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汉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罗荣桓被中共湖北省委农民部派到通城县从事农民运动，组织了通城农民自卫军。根据湖北省委制定的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他指挥农民自卫军智取了通城，缴了反动民团的枪枝，随即组成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由王武扬担任总指挥，罗荣桓任党代表。九月初，罗荣桓等率领崇阳、通城农民武装一百余人到达江西省修水县，同没有赶上八一起义而转来修水的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合编，农民武装编为该团特务连，连长谭希林、罗

荣桓任党代表。

罗荣桓不熟悉军队工作，摆在他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当好党代表？他向警卫团的老战士谭希林等请教。谭希林向他介绍了士兵爱戴的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和士兵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罗荣桓听后很受感动，知道卢德铭指挥部队，不仅是依靠发号施令，更不是依靠打骂惩罚，而是依靠自己的模范作用，所以大家都尊重他，服从他。罗荣桓便以共产党员卢德铭为榜样，同其他党代表一道，在我军历史上，开创了连队党代表的实践道路。

一九二七年九月初，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四个团；武昌警卫团为第一团。秋收起义受挫后，该团特务连连长谭希林调往一营，由朱建胜接任连长。罗荣桓改任团部参谋，仍随特务连行动，与朱建胜共同负责指挥特务连。

九月十九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浏阳文家市。前敌委员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决定改变原来打长沙的计划，转向两省边界的农村进军。在文家市，罗荣桓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听到毛泽东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讲话。在起义受挫折后，毛泽东把革命力量比做一块小石头，把蒋介石比做一口大水缸。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因为老百姓在我们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罗荣桓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增加了坚持革命战争的信心和勇气。二十九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前委决定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营、三营和特务连。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连长曾士峨。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宣布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的决定，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罗荣桓后来回顾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

十月三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离开三湾，当天到达宁冈县的古城。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罗荣桓出席了这次会议。十月七日，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下的茅坪，不几天，又在毛泽东率领下沿湘赣边界南下进行游击活动。途中，罗荣桓积极进行建党工作，在士兵中培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毛泽东还亲自主持了该连新党员的入党仪式。有了我军最早的这批士兵党员，才使“支部建在连上”的重大决定能够实现。

从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湾改编，到一九二九年底古田会议，在两年零三个月中，罗荣桓曾历任特务连、九连、八连和三营的党代表。他是我军最早的也是最优秀的党代表之一。

他在九连工作时，始终坚持一条，凡是要求同志们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打仗时，他和连长并肩冲在队伍的前头，退却时又在最后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支病号或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时，他每夜都要查铺，逐个将战士们的被子盖好。每逢发零用钱，他和连长、司务长又总是最后去领。他自己病了，咬着牙坚持工作，而战士们有了病，他却一天几趟问寒问暖，还要伙房给做好病号饭。罗荣桓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干部、战士的爱戴。

罗荣桓调到八连后，十分注意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了加强党支部的建设，他逐个找干部、战士谈话，认真倾听大家的反映和意见。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积极而又慎重地进行党

的发展工作。当时战士们的家庭大部分在白区，要了解清楚他们的家庭成分十分困难。罗荣桓反复向当时在八连当班长的党员张令彬等交代：“你们当介绍人要特别注意通过谈话把被介绍人的家庭成分、重要的社会关系和本人政治表现搞清楚。”他特别注意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求每个党员都应当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当时连队吃的主要是红米饭，吃饭时没有碗筷，饭熟了，由炊事员捏成饭团，一人一个。因为经济困难，饭经常不够吃。每逢开饭，罗荣桓就带着几个党员去站岗放哨，等大家分完了饭团才回来，有就吃，有时分完了就饿一顿。罗荣桓还要求全连党员分工，对非党员特别是情绪易于波动的战士给予具体帮助。连队的政治教育也抓得很紧很及时。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八连的党员在巩固部队、执行战斗任务、做群众工作等方面，都起到了骨干作用。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宁冈砦市会师。原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编为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罗荣桓任三营党代表，伍中豪任营长。八月，湖南省委代表乘毛泽东不在，附和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致使该团和二十八团冒进湘南，造成“八月失败”。毛泽东带罗荣桓等领导的三十一团三营去湘南接回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已逃散）。当三营夜间通过桂东地区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部队被冲散。第二天清晨集合队伍清查人数时，只少一个担架兵。等部队回到井冈山，发现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三营这次远征湘南，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好成绩，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三营在巩固部队方面所以取得显著成绩，一个重要原因

是，罗荣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部队大力提倡民主主义，坚持肃清封建残余，尊重士兵人格，不打骂士兵。当时，红四军的主力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虽然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但军官中的军阀主义习气仍然相当严重。官长打骂士兵，老兵打骂新兵，几乎是家常便饭。罗荣桓不同意这种作法。他从参加秋收起义以来，从不打骂士兵。即便士兵有了过失，在批评时连重话也很少。他常说：“响鼓不用重锤敲”。他任三营党代表时，曾对一个打了战士的班长谈话说：毛委员再三讲，靠拳头来代替教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志们有了缺点和错误，要反复向他们讲道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自觉遵守纪律。在罗荣桓的耐心教育下，这个班长承认并改正了打骂士兵的错误。

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会上对于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党如何领导军队以及建党、建军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出现了争论。当时任支队（营）党代表的罗荣桓，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但有一些人持反对态度，会议最后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九月下旬，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这次会议毛泽东、陈毅都未参加。这个会开得不好，“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①。在这次会上，罗荣桓发言，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的工作。许多代表都同意，有人即席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大会还为此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十月底，红四军攻打广东梅县

①《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7年9月—1930年4月）。